

傳播與社會發展

朱立・陳韜文

編

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系成立廿五周年紀念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爭論有益於新聞科學的發展

甘 惜 分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民族，也是一個酷愛自由的民族，正因為酷愛自由，所以常在爭論中表達自己的自由意志。從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之爭到漢代的今古文之爭，南北朝的有神論與無神論之爭，宋代的儒學不同學派之爭，清代末年革命與改良之爭，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後反右與反左之爭，改革開放與閉關鎖國之爭，總之，幾千年來，中國人爭論不休。這種爭論有時激烈，有時沉寂，沉寂之後，又趨激烈。有時是在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爭論，有時是在統治者內部的爭論，有時是在人民內部進行爭論。每一個參加爭論的人都認為自己是爲了真理而戰鬥，千年是非，只有讓歷史評說。

爭論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真理愈辯愈明，有如燧石相擊，越打越亮。歐洲之所以存在燦爛的希臘羅馬文化，在於它的奴隸主貴族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啓蒙時期之出現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繁榮，無非是由於自由資產階級羽翼逐漸豐滿，它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向腐朽的封建制度進行沖擊，所以資產階級大胆提出自由民主平等學說，大大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同樣，中國歷代以來的爭論，站在歷史前進方向的人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中國新聞界的歷史，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遙遠的過去大家都很熟悉，這裡不多說了。這裡只就海外中國同胞還不熟悉的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大陸新聞界的爭論提出一些問題，以使我們彼此了解，相互溝通。

爲了使大家了解中國大陸爲什麼會有那麼一些爭論，不能不稍稍回溯一下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新聞事業是怎樣走過來的。中國革命一方面要靠槍杆子，一方面要靠筆杆子，槍杆子在前綫沖鋒陷陣，筆杆子在後方團結和組織力量，鼓舞士氣，吶喊助威。文武兩條戰綫配合得十分完美。因此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新聞戰綫從來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新聞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呢？它是時代的產物。中國新聞思想有兩個根本來源，一個是馬克思、列寧新聞思想的繼承。馬克思、列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他們的一生都在從事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新聞事業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手中的筆就是投槍，他們創辦的報刊就是他們的言論陣地，他們的一生都在新聞陣地上同敵對勢力進行長期的戰鬥，並且在理論上同人們展開爭論。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因此它成爲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人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就開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聞理論以觀察新聞現象。但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同人有不同理解，於是難於避免爭論。

中國現代新聞思想的另一個來源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從十九世紀初期中國出現的近代報刊，就以其氣勢磅礴的政論，向敵對勢力展開旗鼓堂堂的進攻，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等人開其先河，開創了中國政論報紙的傳統。後來的共產黨人從辛亥前後的進步報刊學習了很多東西，其中主要是政論（還有副刊），以政論形式宣揚自己的政策，而政論就必然有所主張和駁斥，於是各報之間爭論之風從未斷過。在新聞觀點上的爭論亦復如此，到底辦報的目的是什麼，也都各有看法。這種爭論一直持續到新中國建立以後。

這似乎不可理解，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大陸歸於統一，各家報紙之間以及所有新聞工作者之間都是爲了一個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那麼爲什麼彼此還會有爭鬥呢？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難理解：新中國建立之後，新聞界的狀況發生了許多新變化。

一、讀者對象變化了。在革命根據地時代，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識字的不多，報紙的主要對象是幹部，通過幹部讀報之後把國內外大事告訴農民。1949年之後，人口結構發生變化，人民的文化素質有所提高，讀者人數大大增加，人民對新聞事業呈現出多樣化的要求，老根據地辦報那種過於單一的形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了。

二、新聞工作者的隊伍也發生了大變化。老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大多數是職業革命家，他們已經習慣於老區辦報的一套方針和方法，他們為中國革命作出過傑出的貢獻，新中國建立後，他們是各個新聞機構的領導骨幹。但與此同時，解放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新聞工作者大會師，他們之間在文化素質、辦報經驗……各方面是不完全相同的。加上每年不斷補充具有大學文化水平的新生力量到新聞隊伍中來，注入了新鮮血液。這一變化一方面給新聞工作帶來了新氣象，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聞觀點、價值觀念的多元化現象。有少數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術研究者接受西方學術觀點較多，於是老根據地新聞工作隊伍那種一體化傾向逐漸溶解，新聞界呈現出思想紛呈的新局面。這種變化到了改革開放後這十來年，更加顯著。新聞工作者中在理論觀點上也有所爭論。

三、各級領導與新聞工作的關係也有了變化。在戰爭時期，為求戰爭之勝利，新聞工作必須服從於戰爭，必須和黨中央以及各級領導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保證高度的集中統一，以便共同對敵，戰而勝之，並取而代之。這在當時從來沒有任何人有過不同見解。但在新中國建立後，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外來的影響，以及新聞工作者隊伍的情況的變化，新聞工作者希望在保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能在新聞工作中具有某種靈活性，使報紙、廣播、電視辦得更加生動活潑，更為人民所歡迎。這種要求本來是完全合理的。若遇上一位思想開明的領導人，這個問題易於解決，領導與新聞單位關係融洽無間。若遇上一位思想比較固執的領導人，這個問題就難於解決。於是議論和爭論就可能產生。

基於以上原因，新中國建立後，新聞界對某些問題的不同看法到1957年尖銳地暴露出來。在所謂的大鳴大放之中，有的正確的新聞觀點被當作謬論，也有的新聞觀點本身有所偏頗。但無論觀點正確與否，基本上都是好意，出於改進新聞工作的善心。遺憾的是“反右派

鬥爭”把這些意見統統打成“右派言論”。從此“左”傾新聞思想佔據上風，不同觀點難於公開討論。到“文化大革命”，封建法西斯新聞控制達到最高峯，新聞爭論完全停止。但人民和新聞工作者的覺悟和識別能力也更加提高。1978年以後，隨着改革開放，新聞爭論又再次爆發，現在擇其主要者介紹如下：

（一）關於新聞媒介功能的爭論

新聞事業到底是什麼？它要幹什麼？它應當幹什麼？這是新聞事業的根本性質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無從談起。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在社會上存在階級區分的時候，報紙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個“總是”就概括了新聞事業的全部功能。以這個思想為指導，報紙每天的任務都是進行階級鬥爭，都要抓階級鬥爭新動向。這個觀點不僅與列寧的思想相違背，而且也與毛澤東在新中國建國前後的新聞思想相左。

列寧在1918年即十月革命之後就指出，要把報紙變成對人民進行經濟教育的工具（《列寧全集》第二版第34卷137頁）。

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就說過，新中國成立後，新聞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429頁）。

可是毛澤東卻在五十年代後期及以後仍提出新聞工作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就造成50—70年代的大悲劇。

於是在八十年代，人們痛定思痛，對“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提出了質疑，認為在和平建設時期，在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社會主要矛盾的形勢下，新聞事業主要的已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新聞事業的社會功能主要地應當是傳播信息和社會監督。報紙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不能以偏概全。這種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贊同。

為什麼毛澤東在新中國還提“報紙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呢？這可能同他的革命經歷有關。他曾長期從事新聞工作，都是在階級鬥爭激流中度過的。他手中的一支羊毫筆橫掃千軍，所向披靡，他的報刊文章可以傳諸百世。他的這一經歷可能養育了他的新聞觀，確認“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但是有些人卻走到另一極端，認為“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的觀點已經完全過時，應當從新聞功能中予以勾消。這種看法是否正

確，可以從中國的國情加以考察。中國現在仍然存在階級，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刑事犯罪分子、盜竊犯、殺人犯、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的分子，他們都危害着社會的安定團結局面和人民生活的安全。廣大勞動人民同他們的鬥爭無疑是階級鬥爭。我們的新聞事業代表廣大人民揭露他們的罪行，號召人民同這些害虫進行鬥爭，這不正是在新聞戰綫上的階級鬥爭嗎？新聞事業的階級鬥爭功能在一定時期內還不會消失。我們不必號召報紙大搞階級鬥爭，但也不要忽視階級鬥爭的存在。目前還不能從新聞功能中把階級鬥爭這一功能勾消。把新聞事業的功能看得全面些，可能是比較求實的。

總的說，新聞事業是一種最有力的輿論工具，而它的輿論作用又是通過傳達信息，溝通情況，和監督社會等等多種功能來實現的。沒有多種功能，新聞事業起不到輿論工具的作用。

(二)關於黨性與人民性關係的爭論

新中國新聞事業最尊崇黨性。共產黨人認為，堅強的黨性是辦好報紙的最高準繩。

但是，到底什麼是黨性，什麼是新聞事業的黨性，卻有不同的理解。

人們通常引用列寧如下一段話：“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的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無黨性的寫作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該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93頁）。

這段話可以引起這樣一種理解：新聞事業應是自覺地把自己作為黨的一部分，自覺地服從領導，與黨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否則就是無黨性或黨性不強。

但是最幾年的討論中，出現了另一種不同意見，這種意見認為：鑒於十年浩劫的教訓，黨的領導是可能犯錯誤的，甚至黨的中央也可能犯錯誤（如十年浩劫時期）。當領導犯錯誤時，黨的新聞事業如果

盲目執行領導意圖，則報紙必犯大錯誤。因此報紙編輯部在發現黨委領導犯錯誤時，不能盲目執行，而應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按人民的意志辦報。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黨終歸要消失，而人民永存，人民萬歲。由此產生一種說法，報紙不僅應有黨性，也應有人民性。

這種看法遭到了批評。認為十年浩劫在黨的歷史上是罕見的，黨犯了錯誤，但黨又自己糾正了錯誤，所以不能因此降低黨性要求，而片面強調人民性。人民性和黨性是統一的，而不是對抗的。“四人幫”不但破壞了人民性，更重要的是破壞了黨性。何況人民是個廣泛的概念，人民有先進、中間、落後之分，有左、中、右之別，我們的黨報只能站在人民的先進部分的立場上來幫助和教育落後部分，黨不能代表人民中的落後性。所以我們不能以人民性來壓黨性，仍應以黨性為辦報的最高準則。

反對者的意見卻認為，人民雖有先進、中間、落後和左、中、右之分，但從總體上說，他們都是人民，都是我們所依靠的力量，我們歷史上從來沒有只依靠人民中一部分的提法，總是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新聞工作者在對待具體問題時可以分析人民中的各個部分，但這並不妨礙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是我們的依靠力量。

有人認為“人民性”這個概念是文學上的用語，它特指歷史上那些非勞動人民甚至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作家和詩人站到了勞動人民立場上從事創作這樣一種特質，不能把文學的術語移植到新聞學上來。新聞學只可講羣衆性。但反對者認為沒有充分的理由論証新聞學上不能使用人民性這個概念。科學上移植概念是常見現象，現代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概念已廣泛移植於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的研究中、並未見科學家們有何異議，為什麼新聞學中就不能移植人民性呢？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黨性來源於人民性。反對者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我們的新聞事業以人民的最高利益為宗旨，是無產階級黨性的源泉，但並不是唯一的源泉。我們的黨性更重要的是來源於科學，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發現了人類的歷史規律，確認世界各民族經過艱難曲折的道路必然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堅定地為這一崇高的社會理想而奮鬥，這就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沒有科學

社會主義就沒有黨性，無產階級黨性主要來源於科學。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黨性決非一個簡單的概念所能概括，它包含了豐富的內容，我把它總結如下：

一、以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觀察客觀世界的思想武器，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背離黨性。

二、正確地宣傳和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如果歪曲了黨的方針政策，也就違背了黨性。

三、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違背人民利益，置人民利益於不顧，就是違背黨性的。

四、堅持真理，不說假話，反映真實情況。一個造謠的，虛假的，說謊話的新聞機構，是違背無產階級黨性的。

五、堅定地同一切錯誤的和反動的思想進行鬥爭，一張在錯誤思潮和反動思潮面前不聞不問，畏首畏尾，不敢與之正面交鋒的報紙是沒有黨性的。

六、服從黨的領導，有堅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一張向黨鬧獨立性的報紙是沒有黨性的。

只有所有這幾方面的總和，才是對無產階級新聞事業黨性的全面理解。

但也有人認為，黨報才要求黨性。非黨報恐怕不能作這樣嚴格的要求。反對者卻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事業都應當具有黨性，因為都在黨的領導之下。而且嚴格的說，在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非黨報。所以黨性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關於掌握新聞規律的爭論

新聞工作有無客觀存在的規律，這個規律是什麼，如何運用這一規律把新聞工作辦得更好，這也是十年來爭論的一個問題。

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觀規律，科學的使命就是認識規律，認識並掌握了這一規律，工作就會大有成效，盲目摸索，就會事倍功半。

新聞工作有其自身的規律，有些人覺得是個怪問題。他們認為在黨的領導下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把黨的主張傳到羣眾中去，這就是新聞工作的全部問題或主要問題。

應當承認，新聞工作服從於政治，是一定階級的輿論工具，它總是為一個特定的階級服務，這也是新聞工作的根本性規律。不管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世界上所有新聞事業難逃這一規律的支配。但是新聞規律還不能簡單地歸之於服從於政治這一條，還有別的許多方面。

新聞工作把客觀世界的種種發展變化傳達於自己的受眾，又將受眾的反映公諸於世，以形成一種輿論環境，借以對社會產生某種精神推動力量。這就是說，新聞工作在客觀世界和受眾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新聞工作在其間扮演着極其重的角色。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一、新聞報導必須客觀真實，如實反映事實真相。

二、新聞報導必須迅速及時。

三、新聞事業必須縮短同受眾之間的距離，一切都要使受眾易於接受。

四、受眾的反饋或評價決定新聞事業的存亡。

以上是我們最常見、最普遍的新聞規律，但它們並不是被所有領導部門和新聞工作者所認識，以致我們經常作出違反規律的許多蠢事。

長期以來，阻礙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是違反新聞規律的“舊聞、不聞”的理論。這一理論產生於戰爭年代，那時敵我雙方生死搏鬥，封鎖消息是絕對必要的，洩漏重大機密將會對對敵鬥爭造成極大危害。不僅在中國，世界各國在戰時封鎖新聞也都常見。在這個意義上說，“舊聞、不聞”也是一種特殊的新聞規律。但就新聞的普遍規律而言，則應當是迅速及時地把實事真相準確地傳達給受眾。

在和平建設時期，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在全國人民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都大為提高的條件下，新聞事業迅速及時地客觀地把國內外的事實真相告訴受眾，這對於調動人民的政治積極性，啓發人民的智慧，具有特別巨大的意義。可是中國新聞媒介做得怎麼樣呢？

一、廣大受眾渴望了解的國內外某些重要發展，報紙上和廣播電視上看不到，看到聽到的常常是“不是新聞的‘新聞’”。而真正的富於新聞價值的新聞，卻“不聞”了。

二、許多重大國際新聞——一年終被評為“十大新聞”的新聞，很難上報紙的頭版，更難上頭條，這就使人民的眼光變得很狹窄。

三、新聞報導常常是不及時的，遲緩的。這裡邊有技術上的原因，但思想上不顧新聞規律的迂緩觀念是主要的。近一年這個缺點有所克服（如波斯灣戰爭的報導很快），但根本變化不大。

四、全國報紙統一宣傳口徑，各報之間缺乏競爭，報紙單一化，而無創造性突破。這就使我國報紙沒有吸引力。

對以上這些缺點，中國新聞界和新聞學術研究機構多次討論和爭論，但礙於中國新聞體制，均無重大改進。

習慣成自然。長期形成的不重視新聞規律的工作方式成了一種難於改變的模式。天天也講新聞改革，但改革的無非是新聞的長短，現場新聞之類的業務問題，而不觸及新聞體制問題。反正我們的報紙有很大一部分是公費訂報，辦不辦在我，看不看由你，即使讀者大減，報紙也照樣出版，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所在。

四關於輿論導向與客觀公正的關係問題

中國新聞界從來重視輿論導向。新聞媒介是一種有力的輿論工具，因此新聞媒介應引導人民覺悟提高，精神向上，更加團結，更加進步。而不是相反，刊登一些錯誤的東西，導致人民政治分裂，思想落後。這是我們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崇高責任感。大陸的新聞工作者認為，必須同那些錯誤的輿論導向作鬥爭。

但是新聞工作者們同樣清醒地認識到，輿論導向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通過對當前發生的重要事件的客觀報導來實現的。事實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首先要尊重事實，如實報導事實，然後對這個事實加以評價，或者表揚，或者批評，或褒、或貶，引導人民辨別是非，選擇自己應有的思想道路。

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既然懷有崇高的社會理想，既然是以人民的最高利益為服務的目標，因而就應該是無所畏懼，對於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重要事件採取客觀公正的態度加以報導。對於國內問題，堅決保護國家機密，而對國家機密範圍之外的新聞，應採取客觀公正的新聞政策，這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

在客觀報導的同時，可以有兩種方式來表達我們對這一客觀事件的立場，一是採取社論和評論的形式，公開宣揚我們對當前形勢的看法，這是坦率的、公開的輿論導向。另一種方法是在客觀報導的同時

在用詞造句之間滲透着作者的政治傾向。這種方式也可以稱為“傾向性的客觀報導。”客觀報導而帶有傾向性，這才是一個高明的新聞工作者的手法。以上兩種方式在一切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中都是習以為常的，並不罕見。這樣就把輿論導向和客觀報導統一起來了。既不是片面強調客觀公正，任意把無論什麼事實都陳列在報紙版面上，也不是片面強調輿論導向，把應該讓廣大人民知道的新聞秘而不宣，徒然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亂。

新聞界絕大多數人認為，不能片面地批判“客觀”、“公正”的口號，要把這個口號本身的含義和資產階級報刊對這一口號的利用區分開來。不少資產階級報刊打着客觀公正的旗號，而實際上向讀者灌輸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偏見。他們的客觀公正是有限的，甚至是虛假的。他們的客觀公正只能欺騙閱歷不深的讀者，而不能欺騙頭腦清醒的人們。但客觀公正本身是新聞工作的規律，新聞媒介如不能客觀公正地反映真實情況，新聞媒介就不可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我們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們尊重客觀。我們不要客觀公正，難道要主觀偏私嗎？我們不能把人類優秀的精神遺產拋給資產階級。

（五）關於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爭論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數十年來為民主自由而鬥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次憲法都有言論自由的明確條款。中國政府認為，中國人民已獲得解放，所有新聞媒介已掌握在人民手中，新聞媒介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人民是新聞媒介的主人公，人民羣眾可以利用報刊廣播電視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以批評政府工作人員，可以監督社會。因此可以說中國人民已享有社會主義的新聞自由。

但是，不少人對此有不同看法。

通常都認為：自由是有階級性的，自由是社會統治階級的權利，一個階級的自由是以另一個階級的不自由為條件，世界上從來沒有普遍自由和絕對自由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是統治階級，那裡一切紙張、印刷廠和廣播電視設備都控制在壟斷集團手中，他們享有充分的言論出版自由，而勞動人民則不可能享有這種自由。那麼，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應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他們應享有充分言論自由的權

利。但新中國建立四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極不完善的，知識分子對此感受很深。例如五十年代對俞平伯的批判，對胡風作為反革命集團來批判，1957年對所謂“右派分子”的批判鬥爭，1958年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六十年代對楊獻珍的哲學思想的批判，對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話”的批判，最嚴重的是“文化大革命”，把大量知識分子和幹部當做走資派，當做叛徒特務和反動學術權威加以打倒，製造了數不盡的冤假錯案等等，都說明社會主義中國還沒有實現真正的自由。

問題還不在於某些知識分子的批評。如果確有錯誤觀點，批判也是完全應該的，批評自由也是一種自由。問題是人人都必須享有同樣的、平等的批評的權利。容許批評，也容許被批評者的反批評，人人有反駁、答辯的權利，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誰掌握真理，誰是謬誤，是會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卻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只要一受到批判，就成了政治問題，被批判者就喪失了反批評的權利，只有挨打而不能反駁。結果要到若干年之後才來平反昭雪，但人事全非，已經晚了。

這種情況是我國缺乏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突出表現。這就是說，中國沒有爭論的自由，本文大談新聞界的爭論，也只是八十年代才可能的事。

此外，中國新聞界缺乏新聞自由還有其他多方面表現，許多新聞工作者沒有寫批評稿的自由，沒有報導消息的自由，這些問題不在這裡多談了。

但是從黨和政府的角度看，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也會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黨的輿論機關，要加強組織性，必須無條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允許發表與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相違背的言論。”（《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下冊688頁）中國黨和政府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遵守宣傳紀律，是新聞工作的準則。

但有些新聞工作者仍然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遵守紀律同新聞自由是並不衝突的，在四項基本原則之下，仍應調動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仍應在一定限度內具有報導消息的自由、批評的自由、學術討論的自由等等，否則無從表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有些人認為，

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應享有自由權利，如對自由限制過死，則不符合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原則。

毛澤東有一段著名的言論：“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56頁）。這一思想至今為中國知識界所推崇，更為新聞界所向往，認為這是中國的理想政治。

問題是，有些人一聽到“新聞自由”這個字就神經緊張，就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忘記了人類歷史上一切先進分子所為之奮鬥不息的就是免於飢餓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先烈們怎樣畢生為爭取自由而流血犧牲，他們忘記了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怎樣為民主自由而鬥爭。自由是一個崇高的字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一個人人享有廣泛自由的、人人可以自由地發揮其聰明才智的社會。對自由的尊重就是對人類、對人民、對文明的尊重。共產主義者過去為奪取自由，現在仍要為保衛自由而戰。

當然，自由不是絕對的，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那種打着自由的旗幟企圖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同我們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畢竟是兩回事。必須同濫用自由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作鬥爭。

自由和紀律是相反相成的。假自由之名而泄密，誹謗，誣陷，以及進行一切違反憲法的言行，都將受到法紀的制裁。無法紀則無安定團結，但無自由也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安定團結。

（六）關於新聞批評的爭論

人所共知，中國共產黨是歷來都強調報紙批評的。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後，更是多次強調在報紙上開展公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

這個問題要追溯到列寧的新聞觀點。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就曾多次要求報紙把壞人壞事的典型登上報紙的“黑榜”，而把先進人物和先進事例登上“紅榜”。以這樣的方式使報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其特殊的推動作用。

中共中央在1950年曾通過“關於在報紙刊物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針對大陸解放後黨成為執政黨，最易受嚴重的官僚主義

的毒害，如不能及時揭露領導機關和幹部中的錯誤和缺點，就不能完成建設建設新中國的任務。決定並且指出，報紙的批評應由編輯部獨立負責而不受干擾。此後又在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改進報紙工作決議中指出，這種批評應是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是嚴肅的而不是任意的。報紙批評應在黨的領導下進行。

毫無疑問，以上兩個決議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正確決議。如果能按照黨中央這一決議辦事，對於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事業和黨風、社會風氣的改善，都將產生巨大的作用。

這兩個決議發表之後，報紙的批評曾一度有所開展，五十年代前期，報紙的批評性報導和諷刺性雜文有所加強，在讀者中引起較好反響。但是從整體上說，中國報紙的批評基本上沒有正常開展，正如上述中共中央1954年報紙工作決議所說：“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進行得好，而是基本上進行得不好。”其原因是阻力和干擾太大。干擾源有時來自下邊，更主要的來自上邊，來自某些領導部門。只報喜，不報憂，愛好吹捧，不聽諍言，使許多報紙的批評無法開展，編輯部和記者為此而產生難言的苦惱。這就大大削弱了報紙的戰鬥力。

到了林彪、“四人幫”控制報紙的十年，報紙的正確批評完全絕跡，而對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的亂打棍子、亂戴帽子的所謂“大批判”卻喧囂了十年。

由此人們更加認識到報紙上開展批評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宣傳部1953年曾有一條批示，認為報紙不能批評同級黨委，如果公開批評，就是以報紙與黨委對抗。例如省報不能批評省委，地市級報紙不能批評地市級黨委。也就是說，報紙不能批評自己的領導，至於上級黨委，報紙更不能批評了。

這個批示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有效。

這個批示沒有具體分析：報紙不能批評同級黨委是不能批評黨委會，還是黨委會的成員也不能批評？實際上報紙不但不能批評同級黨委會成員，而且與黨委同級的政府組織和羣衆團體也不能批評。於是報紙上的批評只能批評基層組織中的個別人和事。批評較為負責的領導人員極為罕見。

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在革命事業中的戰鬥作用。

八十年代以來，黨內風氣和社會風氣問題日益嚴重，而報紙卻難於及時敲起警鐘，眼看不正之風有日益蔓延之勢，舊社會的種種弊端卷土重來，報紙卻無能為力，這是我國新聞工作的一大失誤。

這個問題是我國新聞界議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它同中國的政治體制，同傳統的中國文化有關，不是輕易地可以解決的，但是又非解決不可。如果不能適當地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社會風氣和黨風就缺乏制約力量，更難改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是無所畏懼的，害怕批評的人們就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七)關於新聞的指導性問題的爭論

這個問題從五十年代就開始有議論，那時有些同志針對報紙內容的枯燥和形式的單調，把這些缺點歸之於強調指導性太過，因而反對指導性，而提倡商品性。

到了八十年代，這個問題更見突出。由於改革開放，有些人要求於報紙的是知識性、趣味性、可讀性……討厭報紙板起面孔說教，反對指導性。

持相反意見的人們以為，中外古今的新聞事業莫不具有指導性，它們或者指導人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或者指導人們屈從於帝國主義和作封建皇帝的順民。他們或者指導人們相信宗教，崇拜教會勢力，或者反對宗教，號召人們覺悟起來搗毀宗教勢力。它們或者指導人們推崇民主與科學，或者指導人們反對民主與科學。它們或者指導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建設社會主義，或者指導人民反共反社會主義。它們或者指導人民奮發向上，身心健康，或者勸誘人民聲色犬馬，耽於享樂，不復有上進之志。總而言之，天下的新聞事業無一不具有指導性，不具有這種指導性，就具有另一種指導性。不帶任何指導性的報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談。

問題是怎樣指導，是空洞的、枯燥的說教？還是把指導性同知識性、趣味性、可讀性等等統一起來，把指導性寓於受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之中。在這點上，我以為許多西方優秀記者的作品比我們要高明一些。他們的新聞和通訊特寫有的寫得生動有趣，抓取對象中具有典型特征事物，使人讀起來感到有趣和親切。這些記者運用這種形式把他們的思想讓讀者不知不覺地加以接受，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指導性。

可見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指導性”，而要對指導性加以具體分析。所有的新聞記者都應當運用生動活潑的形式來實現對受眾的思想指導，社會主義中國的記者尤其應當掌握此中的奧秘。

至於那種反對指導性而提倡商品性的理論，則未必適合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需要，倒是可以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商業性新聞媒介所接受。提倡商品性就是提倡滿足市場需要，市場需要什麼，就販賣什麼，如此而已。報紙則不同於一般商品。報紙雖然也是通過貨幣交換到讀者手中，它是一種商品，但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種精神產品，它不是滿足人民生活上的某種需要，而是追求在精神上，思想上對讀者產生影響。報紙的價值不能以它值幾枚貨幣來衡量，而是以它所產生的思想影響來衡量，假使兩張報紙以同樣的貨幣售出，其中一張思想健康，不但使讀者認識當今世界，而且促使人們發生改造世界的奮發意志；另一張報紙則內容猥褻、頹廢，使讀者走向墮落。請問這兩張報紙的價值如何？新聞理論中的商品論者則不加分析，一概稱之為商品，實際上是向市場需要看齊，投合一般小市民之趣味，這是一條新聞工作的邪路。以這種理論指導新聞工作，又以之指導人民的思想，是絕對不足取的。

以上略舉了中國大陸新聞界的爭論，遠不是全部。

不動刀槍，只動口舌和筆墨的爭論無損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却有益於科學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十年來的討論和爭論至少有以下幾個好處：

一、澄清了些問題，即使一時尚無定論，也發掘出了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開闊了人們的思維，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如果我們的討論和爭論更敞開一些，收穫還會更多。

二、初步打開了國際新聞文化交流，使我們了解當代世界的新聞思潮的動向。

三、鍛練了我們的隊伍。改革開放之前，新聞學研究者寥寥可數，新聞書刊也極少。現在人員大增，研究所林立，新聞學專著有數百種之多，新聞學專刊也達數十種，這是前所未有的新現象。

四、推動了新聞改革。中國新聞界目前的改革雖主要是業務性的，但這種改革也是十多年來新聞界人士奔走呼號的結果，並已初見成效。

中國的新聞改革首先着眼於國內，對人民進行宣傳鼓動，向人民傳播國內外信息，開啓人民的智慧，調動人民的建設積極性。這一切都是對的。但我們不只要面對國內，而要面對世界，走向世界，在國際新聞競爭中戰勝強手，以擴大中國的世界影響。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特別在政治上影響巨大。中國又是一個出新聞的大國，世界人民關心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但是中國現在還不能稱為新聞大國。這不是我們的技術不如人，也不是中國記者缺乏才能，而是我們新聞體制還有待於進一步改善，以適應日益發展的新形勢。這就需要我們在思想上，理論上對新聞問題有更深層的共識，需要對一些理論問題作進一步探索，我們要提倡這種探索。

新聞學還年輕，比起其他學科來，新聞學還是小弟弟。甚至在圖書館裡還沒有新聞學的分類。但是什麼事情都是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從幼年到成年。再過若干年，新聞學也會壯大起來。現在人笑我，他年我們也決不笑人，科學上耻笑別人的人常常是最可笑的人。只要我們上下求索，追尋真理，我們是會有廣闊的前景的。

最後，我想附帶說幾句。如果人們問我：你似乎客觀地介紹中國大陸的新聞爭論，請問你是哪一派？我的回答是：我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我又是堅定的改革論者。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學說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能不受歷史條件的制約，他們的個別論點可能因歷史條件的變化而過時了。但是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學理論，應當作為一切尊重科學的思想先進的人們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應當具有創造性，不斷迎接新的挑戰，對新事物進行新的具體分析，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又是改革者。在新聞學這個領域內，我的態度也是如此。研究新聞學而不遵循馬克思主義原理，其理必歪。研究新聞學而不思變革，故步自封，其理必殘。諸公以為如何？

（一九九一年一月於北京）